

唐浩明

评点 曾国藩语录

上 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唐浩明·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唐浩明

• 评点 曾国藩语录



唐浩明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 : 全 2 册 / 唐浩明著 .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2014.1

ISBN 978-7-209-07225-0

I . ①唐 … II . ①唐 … III .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 语录 IV .
①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3676 号

责任编辑 : 张静芳 王海涛

封面设计 : 蒋宏工作室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 (上下)

唐浩明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 250001

网 址 :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59.75

字 数 100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225-0

定 价 9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0531) 82079112

序 言

| 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与他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聊天时，谈到毛的家世。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这一年，曾国藩(涤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启超(任公)也刚好四十三岁初度。将梁与曾氏并列作为农家子弟中的卓异代表，大概不会始于杨昌济，但二十二岁的毛泽东，此时很可能是第一次从他所崇敬的师长口里听到二人并提的话。

杨昌济并列曾梁，着眼于同是农家子弟同样声名卓著，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论及，当我们稍稍接触一些梁的文字后，便可以明显看出曾梁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即曾氏对梁影响甚为深远，或者说，梁刻意向曾氏学习。

梁是广东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产生的种种隔阂的缘故，他直到二十八岁才在国外读到曾氏的书。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旅居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在给其师康有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到初读曾氏家书时的震动：“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弟日来颇自克励，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从那以后，梁便将曾氏引为人生榜样。直到晚年，其对曾氏的景仰之情依旧不改。他对人说：“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启超为什么会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学到些什么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务著述异常繁忙之际做了一桩大事，即从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语录，

汇辑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钞》，并为之作了一篇序言。从梁的这篇序文和他所选语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曾氏的认同之处。

梁认为，曾氏不仅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而这个大人物，并没有超伦绝俗的天才，反而在当时的名人中最为鲁钝笨拙。那么是什么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说曾氏“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自己首先在这一点上着意向曾氏学习。

曾氏初进京时刻苦研习程朱之学，并身体力行，要做一个无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时对自己身心各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并效法曾氏以日记作为督察的方式：“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

人的一生最难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谓的钝拙之资成就大事业，靠的就是这个“恒”——数十年如一日的劳心劳力。梁虽天资聪颖，但只活了五十六岁。自从二十多岁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过，除大量的政事、教学、社交等占据他许多宝贵的时光外，还要承受动荡不安的流亡岁月的干扰，而他却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精彩著述，其内容几乎涉及文史哲的各个领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奋。他说他“每日起居规则极严”，“所著书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学生说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不稍休息。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许有天性，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自律。他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信中说：“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湘乡即曾氏。曾氏所说的这句话，见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九给他九弟的信。梁不仅将这话记于心付于行，而且又将它抄下来，编于《嘉言钞》中，提供给天下有志于事业者。

从梁所辑录的这部《嘉言钞》中，我们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关于立志、关于恒常、关于勤勉、关于顽强坚毅方面的嘉言，足见梁对曾氏这些方面见解的看重。随着这部《嘉言钞》的问世，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曾氏当年“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的具体做法，在一段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对当下生存的启示。

作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梁更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他在序文中说：“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实事来报答

社会，这是梁启超的人生选择。接下来，他谈到自己从政二十年来的重要体会：既要做事，“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炼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与浊世打交道，在此浊世中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炼，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很好地应付方方面面，不至于受挫受阻，这就是人世间的最大学问。他认定曾氏便是这样一个拥有最大学问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过去都说曾氏是理学家。其实，他对理学的学理并没有大的推进，他的贡献是在实践上。在如何将理学用之于身心修炼及事业建立这方面，曾氏是一个成功的践履者。曾氏以中国学问为教材，不仅尽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并因此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认为，人生的“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这一点上，曾氏与梁启超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在这部《嘉言钞》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办事的。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军国大事，也有木头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启超说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既亲切，又实用，这就是当年梁读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们读《嘉言钞》时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即梁特别注重曾氏对当时堕落风气的谴责以及对扭转时风的自我期待与担当。梁不惜反复摘抄曾氏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说的有关言论，于此不仅能看出梁对曾氏这些议论的认可，还可感受到梁本人对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责任感。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

梁在《说国风》一文中说：“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

显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说来为自己的文章立论。曾氏认为，处在众望所归

之地位的一二人，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是负有引领之责的，而风气一旦形成，便又会影响各个层面上的人，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曾氏一向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为名满天下的维新派领袖，梁又何尝不隐然以“一二人”自许呢？在这一点上曾梁之间可谓惺惺相惜。

“一二人”靠什么来扭转风气呢？理学家曾氏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对此，曾氏有过表叙：“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鳞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革新家梁启超对曾氏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甚为赞赏。临去世的前两年，他曾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有过一次恳切的长谈。他说：“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他们就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梁早年系维新变法派，后来转为共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对于张勋复辟清王朝的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而曾氏则是彻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在某些人看来，梁不应学曾氏而要咒骂他才对。其实，人类文化中的精粹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属于人类文化精粹的部分。梁说曾氏是“尽人皆可学焉而至”的，他自己学习而有成效，于是想让大家都来学习，遂在百忙中抽空编了这本《嘉言钞》。梁认为他所编的这部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好比穿衣吃饭一样的不可一刻离开。笔者也一向认为曾氏可学而至，且有感于“布帛菽粟”这句话，遂在评点曾氏的家书、奏折之后，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又来评点一番梁所辑录的这部《曾文正公嘉言钞》，

无非是想让梁启超的意愿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最后，还有两点要向读者诸君交代。

一、梁启超对他所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还有过体例上的说明，为方便读者阅读，择其重点如下：

“是编从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集五种摘抄。其余嘉言散见他种遗著者则付阙如。

“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实用耳。亦有因此一义而屡见屡抄者，以存文正强聒不舍之真，亦使读者得日习而悦之益。

“文正居大乱之世，半生治军，是编所抄言战事者亦什之一二。其为军人宝鉴而无待言，即非军人，亦当涵咏其理而善推之于用。盖人生天地间，本以奋斗为生涯，何时何事非在战争中者？是编所抄关于军事诸条，吾确信凡任事者苟能体其意而服膺之，必终身受益不尽也。

“是编所抄关于观人用人之诸条，读者可以为文正秉权势居高位故能尔尔，吾侪则无需此。其实不然。人无论居何地位执何职业，皆须与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读此，无往而不自得师也。

“文正于学术文艺独得处甚多，垂训亦至精，今所抄从略。”

二、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三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一九九三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鉴于此，笔者亦对此书加以评点，并附录于后。此书也有“割裂”“屡见屡抄”的现象，其用心当与梁氏所说者同。另，这两本书免不了有重复之处，为保存原貌，亦不作删节。

嘉言钞即语录。为便于当今读者的认同，华夏出版社再版时建议将此书原名《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改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我认为这是可以的，特此说明。

唐浩明

于长沙静远楼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

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

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炼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歿，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近。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楷模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目 录

【上】

书 札 / 001

家 书 / 047

家 训 / 089

日 记 / 103

文 集 / 119

治 身 / 135

治 学 / 357

书
札

湘中士人集团的领袖贺长龄

原文

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而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译文

今天谈论治理国家的方法，则不如研究名与实之间的综合审核；今天谈论学术，则不如择取笃实苦干的人士。事物到了极点则发生变化，挽救浮华的莫过于质朴。长久疲沓之后，以猛烈来振作，其用意就在此吧！

评点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写给贺长龄信中的一段话。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说一下贺长龄。

在曾、左大显之前，湖南先后出现过四个著名的督抚。他们是陶澍、贺长龄、李星沅、劳崇光，均为湘中士人集团所尊敬的人物。这四人中，名声最大的是陶澍，影响最大的则是贺长龄，甚至可以说，贺是早期湘中士人集团的领袖。这是因为，一则贺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对于以经世致用为价值追求的湖湘士人来说，这部书乃他们的必读之书，且贺人品端方，为官有政绩，于是自然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二则贺氏家族势力强大，人脉广泛。贺的弟弟熙龄、丹麓等或为朝中御史，或为社会名士，都有相当高的时望。贺家还在长沙城里办学经商，财力雄厚。湘中士人里的头面人物如左宗棠兄弟、罗泽南师生、江忠源、刘蓉、欧阳兆熊以及湘阴郭家（郭嵩焘兄弟）、善化孙家（孙鼎臣兄弟）、茶陵陈家（陈源允兄弟）等都与贺家关系密切，有的还在贺家做过西席。所有这些，使得贺长龄在当时三湘士林中有着极高的声望。

贺长龄官运亨通，由翰林而知府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而总督，但晚年却因镇压地方动乱不力遭劾革职，回家后不久便抑郁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咸丰元年，家道已明显走下坡路的贺家，主动与官运日隆的曾氏结儿女亲家。贺家试图通过这种联姻来重振家道，但可惜的是贺家之女在过门一年后便难产去世，不久其弟丹麓与嗣子少庚亦相继去世。曾氏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耦耕先生学问文章卓绝辈流，居官亦恺悌慈祥，而家运若此，是不可解！”

贺长龄生前家道兴旺四十余年，死后仅十年便气象凋落，这在官场中并不

少见。曾氏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贺家为“一代享用便尽”又提供一个例证。

早具坚车

原文

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

译文

我们今天倘若有所发现，又想作传之久远的打算，能不早早地预备坚实的车子吗？

评点

此话出自道光二十三年致刘蓉的信。刘蓉亦湘乡人，与曾氏相交十分投缘，此时不过一秀才功名的塾师，而曾氏却在京城给他写论文与道的长信。这句话的前面，曾氏写道：“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道是靠文来承载的，文好比车，浮华的文字如同虚车，质实的文字则如同坚车，故而有志于将自己的所见所得传之后世的人，一定要把文字功夫练好，把文章写好。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曾氏很重视文章写作，并于此下过很大的功夫。进京之初，他便告诉诸弟：“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三十四岁时，他的文章已经成熟，自认为“将来此事当有成就”。仗打得最艰难时，他不怕死，怕的是心中对古文的研习所得未能尽告世人，而成为《广陵散》。

一手好文章对曾氏一生事业上的帮助甚大。早年，正是因为文章好，让他赢得很高的知名度，从而仕途上一路顺利亨通。后来组建湘军，他的文名也为他招致海内众多学问优长之士，一时幕府之盛，并世无双。尤其是他一生丰富的思想与深厚的阅历，都能借助于精确传神的文字予以表述，这是他本人之幸，也是后世研究者之幸。

忍耐冷苦劳闲

原文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译文

忍耐冷清忍耐艰苦，忍耐劳累忍耐寂寞。

评点

道光二十六年，友人黄廷璇任职苏州，曾氏在给黄的信中勉励他要耐得住冷、苦、劳、闲：“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存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水时或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六年后，曾氏在长沙办团练，黄廷璇以在籍江苏候补知州的身份协助。由此可知，黄去苏州任职时官阶不高，既为候补，则权位亦不重。黄应是苏州官场上一个不甚起眼的人物。所以，曾氏以耐字相送。

官场是最为露骨最为严酷的名利场。此场可得名与利，但不是人人均分，厚此薄彼、尔荣我枯是它最大的特点。志得意满者从来都是少数，压抑郁闷者却是多数。黄廷璇既然在官场上不起眼，那压抑郁闷一定是少不了的。笔者由此想到，自古官吏都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这事除开道德的原因外，还得从心理上去寻找原因。小官小吏在场内屡屡受上司的训斥，时时没有自我，心里的委屈、愤懑和自尊的失落感，便只好对场外的平民百姓去发泄，借别人在他面前的卑躬屈膝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由此看来，官吏欺负百姓的现象，似乎永远无法根绝。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名利场，只是相对于官场来说，显得较为隐晦一点罢了。它同样存在着冷与热、苦与甜、劳与逸、清闲与显要等等不平等，在许多时候，个人对这种不平等是无力改变的，也只能奉一言以行之，曰耐。

人才高下在志趣

原文

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

译文

人素质的高低，看他的志趣所在。志趣低的安于流俗平庸浅陋的陈规，于是日益变得污下。志趣高的仰慕先贤崇隆的行事，于是日益变得高明。

评点

好友欧阳兆熊的儿子欧阳勋，年方二十而志趣高远，曾氏写信鼓励他继续

努力。由志趣所向来预卜年轻人的未来，这是衡人一个重要法则。欧阳勋勤奋好学，少有大志，本可有所作为，惜未而立即因病辞世。应其父所求，曾氏为他的文集作序，称赞他的文章如同诗一样：“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

可为浩叹者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译文

无士兵不足以深忧，无军饷不足以痛哭，唯有放眼看当今世道，寻求一个谋取利益不走在前面、奔赴正义唯恐落后、忠愤耿耿的人却不能很快得到，这才是值得浩叹的。

评点

咸丰二年十二月，曾氏奉旨出山，办理湘省团练事务。时局混乱，办事极难。陶澍的女婿彭申夫致信给曾氏，说“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这话与曾氏的看法完全一致。曾氏遂复信彭，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当今办团练，无兵无饷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勇赴公义的人才。将人才视为第一要素，这是曾氏事业成功之秘诀。

独赖耿耿忠心

原文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庶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译文

现在什么事都荒废而不能举办，各种弊病都已并发，不可收拾，唯有依赖这颗耿耿忠心，与民众共处于白骨如山积血如潭之中，希望能堵塞横流的人欲，借以挽回厌恶混乱的天心，或许有万分之一的补救。否则，但就局势来说，则像洪水滔滔的局面，我不知道何时是终结。